

# 军统

陈恭澍 著

Cutthroat

# 第一杀手

## 回忆录

亲历 \* 军统抗战前期工作记录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1907年生——歷任國民黨軍統局北平站  
 站長、天津站、上海區區長、第二處處長、  
 為戴笠  
 手 下「軍統四凶」之一  
 陳恭澍  
 趙理君、沈醉、王天木  
 之一——專職策劃、指揮、執行暗殺  
 行動。1980年赴臺——至今去台在內及墓葬位置均不可

亲历✱军统抗战前期工作记录

# 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

陈恭澍 著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. 2 / 陈恭澍著. — 北京 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0.11  
ISBN 978-7-5057-2837-0

I. ①军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军统局—史料 IV. ①D693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0 ) 第223522号

原著作名：《上海敌后抗日行动》（作者：陈恭澍）中文简体字版©（书名《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2》）2010年本书由传记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授权，同意经外图（厦门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，由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授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，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。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、转载。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登记号 图字：01-2010-5982

书名 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2  
作者 陈恭澍  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
经销 新华书店  
印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 
规格 700×1000毫米 16开  
19.25印张 210千字  
版次 2010年11月第1版  
印次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 
书号 ISBN 978-7-5057-2837-0  
定价 29.80元  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-1号楼  
邮编 100028  
电话 (010) 64668676

## 自序

《上海抗日敌后行动》（本书原名。编者注）是拙著“英雄无名”全书中的二部。

先前所拟的书名，原是“百战声威”，不能说没有意思，可是却不能一眼看出书里写的是什么，所以就直截了当地改成“抗战期间上海敌后行动”。再一想，十个字的书名未免嫌长了些，也实在很少见，几经斟酌，不如光用“上海敌后行动”，比较来得响亮而有力。不过，有人指出，若不标明时代背景，恐被误认为是现在所发生的事，因而才决定为“上海抗日敌后行动”。

这一部书所展现的，是另一个阶段辉煌而壮烈的新篇，但在内容、主旨和精神上，则与前一部仍然是脉络相承的。此外，作者更希望能充分表达出当日在沦陷区的大上海，处于日寇、汪伪以及外国租界甘为鹰犬警探三面为敌的险恶环境之下，我全体工作同志，艰苦卓绝，奋勇牺牲的真相与事迹！

书的内涵，就是抗战时期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”所属“上海区”杀敌除奸的重大案件。主要是追述“自二十八年（1939）八月至三十年（1941）十月，两年多的时间内，‘上海区’

同志，全体用命，表现了最具歼敌威力的重大作为。”

为什么要剪头去尾，单说“二十八年八月至三十年十月，两年多的时间内”呢？因为此一阶段，适值对日抗战紧要关头，也正是作者本人负责“上海区”的时期。以此身份，记述其事，自然是最熟悉最能存真的了。

首先需要交代明白的是：“上海区”的作为，只是“军统局”在大上海地区全盘工作中的一部分，也就是说，“军统局”在此一地区的部署，除了“上海区”之外，同时还有其他的工作单位。如果再扩大范围来说，在抗战时期，我党政军当局，留置或派驻以及陆续潜入上海的秘密单位，还有许许多多。当然，各守各的岗位，亦必各有各的贡献，事实俱在，不待多言。唯我“上海区”除情报策反之外，却又独具一项特点，那就是不断地用武装力量与敌伪相周旋，并迭次予以重创，从而树立了震慑群丑，提振陷区民心，坚定抗战意志的国家威望。

这部书的记述方式，也和前一部不大一样。以前，作者本人除策划指挥之外，自己还参加了实际行动，迨至到了上海担任区长之后，因为组织机构庞大，指导层次增多，另一方面又必须顾及整体安全，事实上已经没有那种必要，所以对许多案件的详细过程，也只能在下达命令和审阅工作报告时，知其梗概而已，甚至连当面听取口头陈述的机会也不多。因是之故，有许多细微情节和现场上敌我双方的一些小动作，可就写不出来了。为此，乃不得不多方查询，访问搜集有关数据，俾从记忆深处，再钩现出一星半点。

“上海区”是“军统局”领导下国内外百数十个外勤单位中最大的一个，若与其他同级单位比较，或就一种秘密组织的编制员额而言，的确是异乎寻常的“大”、超乎情理的“多”。在当时固然是为了适应工作上的迫切需要，但毕竟违反了秘密组织利于精简灵活的基本原则，这也就是导致后来遭遇重大挫败的主要原因。

“上海区”究竟有多大？也该略加说明：以往作者服役过的“北平站”、“天津站”乃至河内工作的临时编组，少则十余人，最多也不过二三十人。而“上海区”可就不同了，记得最盛时期，竟高达千人之众，这真是难以想象的事。其内外各级区分大致有如下者：

复式区本部有二处至三处，采取流动变换的方式，不固定在一处办公。这些处所，由助理处记配属交通、译电诸员分别驻在。另区本部书记个人住所则综理经常业务。

联络（接头）站、交通（传递）站内外共22处，其中包括掩护商店等，每处都有联络员、交通员，分别负责担任所指定的业务。

常设电台三座，只限与重庆互相通报，三台之间则不发生横的关系。各台的一般通讯业务由区长指定专人督导；其有关机务上的技术问题，局本部主管单位则直接派有督察办理，不受“上海区”节制。此外，还设有预备台一处，以备不虞之需。

局本部在上海地区又派有主持财务的“总会计”，“上海区”的经费例由“区会计”向其具领转发。为求谨密，“区会计”虽只一人，亦另行设址单独办公。其最使人困扰的是必须保管许多不可销毁的单据，类如房屋顶让契约、经费收支账目、

领款收据及购置发票等等。由于这些单据包括了项目、人名品名、公司行号名、时间、地址多项，随时随地都有泄密的危险。一旦落入敌手，就是“罪证”，并且成为追查线索、按图索骥的依据。我们在敌后工作，这实在是一个大忌。为了这个问题曾往复研商多时，但是会计作业是独立的，它并且强调任何开支必须凭着原始单据才能向上报销，所以迄难获得一个结论。尽管不断地在改善名称、数字等的登录技巧上下工夫，可是依然抹不掉那些启人疑窦、欲盖弥彰的记号。结果，这些单据终于成了阎王殿上的勾魂簿。

为了支持破坏工作，我们要制造并发展一应爆炸或燃烧的简易炸弹之类，所以一处小型的技术研究室，亦不可缺。因恐在住宅区内发生意外，更设有爆破器材储存场所一处，我们的术语称之为“仓库”。

以上这些，是我们的“内勤单位”，列为“外勤”的，则有以下各单位：

新建高级情报搜集及行动工作混合编组一组，组员皆受过专门训练，其中不乏留学国外者。正式名称是“新一组”，全体同志约40人。

情报搜集单位及一切软性工作的执行者，如策反、反间等，有五个组，各组人数不等，最多的超过30人。每个组也都各有其不同的特性，冀能收得运用裕如的效果。

专事执行行动破坏工作的，编成八个大队，每一大队下分二至四个中队，中队以下，各分为若干个小组，每一个小组则由三至五人组成。粗计一下，每一大队平均有三四十人的实力，且均配有超额的轻便武器。

除此之外，未正式纳入组织体系的，尚有协力“上海区”工作的抗日团体爱国青年干部多人，以及上级交联的个别人物等，其中外籍人士为数亦不少。这些人固然各有其社会地位与特殊路线，可也是最难处理的一种特别运用人员。

这里必须指出：像这么大的一个秘密工作团体潜在敌后，不仅在我国情报活动史中应属仅见，就是在第一、二两次世界大战时，也还少有。而今而后，随着科技进步，环境变迁，这种畸形发展的组织，想必不会再次出现了。

上级赋予“上海区”的工作任务，项目繁多，依业务分类，有情报、行动、策反、反间、心战、政战、青运、工运、技术研究、联络沟通等等。为了切实执行以上这许多任务，一方面遵照上级指示的原则，一方面再根据“上海区”本身的工作能量，衡其轻重缓急，而后剑及履及，全力以赴。其所以不惜牺牲偏重于行动工作的理由，是在针对当时沦陷区的现实情况，冀望发挥威力震慑的效果，以打击敌伪的气焰，振发全国的民心士气，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。

当然，行动工作纯粹是真刀真枪、斗智斗力、血肉相拼的事，此消彼长，立竿见影，这要完全依靠事前的调查、策划和临场的部署与牺牲精神，绝不能碰运气，或存有丝毫侥幸之心。自笔者负责“上海区”两年多以来，仅就个人牺牲而言，其中为国捐躯、受刑伤残、身陷囹圄者，总数超出两百余人；论及给予敌伪的打击，除去不能用单一数字表达其绩效者，如情报的功能、反间的作用、心战的成果等无法加以计算外，根据不完整的统计：制裁大小汉奸走狗100余名，破坏日寇军事设



施及焚毁军需物资等50余件次，另外，最使敌军丧胆的，是格杀了日本现役武装官兵约60名。于此，我方牺牲之惨重亦可想见。至民国三十年（1941）十月底作者本人失事被捕后，敌伪于十一月二十八日曾在报纸上以整版的地位公开发表“案情”，其中有：“情报机构五组名单”、“沪区八大行动除名单”，并附有“蓝衣社在沪所犯案件统计表”一张，表内分别列出时间、地点、死伤者之身份姓名及行动单位各栏。其所称各节虽不完全正确，在事隔四十余年后的今天看来，当是最具参考价值的上好数据了，作者的老战友黄志远先生，他保存了当日的《新申报》一张及《中华日报》半张，当作为本书的重要参考。

行动、破坏，总免不了烧杀，就是作者本人，也有时觉得心存不忍。不过，这是对日抗战时期我政府在沦陷区所采取的一项政策，参与实际工作的我等，都是政策的执行者，个人不作主张。征其实，我们的工作同志，都是正义的和理性的，绝不是嗜杀的人，之所以能够提付那份锐不可当、奋不顾身的勇敢，多是受了政治信仰和民族意识的支配与鼓舞，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延续、国家的独立与自主，强敌当前，义无反顾，这就是最鲜明的例证。

陈恭澍  
1984年8月

## 第一章 临危受命，担任“上海区”区长

民国二十八（1939）年八月初，笔者临危受命，任“上海区”区长一职。“上海区”系“军统局”部署在敌军占领区中最具威力的一个秘密组织。其组成，除复式区本部一处两址外，共分为交通联络22站、电讯四台、技术一室、会计一室、情报五组、行动八大队、新编混合一组、工运一小组、抗日青年一团等50余单位，另有直属工作路线数十条。全体员额经常保持在1000人上下，并配备各式通信器材、多种爆破器材以及武器弹药等。

死无对证永成悬疑的大反间 ■■■ 3

危机四伏中稳扎稳打渡过难关 ■■■ 6

我们的敌后工作指挥中心别具一格 ■■■ 10

无所不在的战斗行动者 ■■■ 20

## CONTENTS 第二章 风雷初动，上海“敌后工作”全面启动

抗战期间，沦陷区中，有关打击敌伪、振奋人心的行动与破坏等“敌后工作”，一直由“军统局”担当。为达成此项使命，戴笠将军曾激励部属说：“必须扩大行动，发扬吾人权威，以寒敌人之胆。”此际，各战场战事正激烈进行中，为战略上或政策上之配合，所有敌后工作，齐步同发，绝不容许脱节落后。身为“军统局”工作人员的吾等，亦自当为抗日锄奸而不顾牺牲流血，尽其努力。

杀一儆百以展示威力 ■ 35

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内部又出祸害 ■ 40

人事经费时常困扰着陷区单位 ■ 46

异地重逢，谁料想曲径通幽 ■ 53

### CONTENTS 第三章 制裁叛徒，维护道义和纪律

虽然很难为特务工作定下一套道德标准，但由于其特殊性，又受着道义和纪律的严格约束。“军统局”的作风，更是雷厉风行。制裁叛徒，就是其中极严厉的一条。二十八年（1937）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三时半，背叛组织、投伪求荣的陈第容（明楚）、何行健（天风）二人，终于被我方行动人员格杀于上海愚园路惠尔登舞厅门前。全部经过复杂而又曲折，有些问题迄今得不到解答。

初生之犊组成了一支生力军 ■ 63

从铁的纪律、生杀权限说到道德观念 ■ 65

要多杀几个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人 ■ 81

## CONTENTS 第四章 三面受敌，迭次完成上级交付任务

从事敌后工作的秘密组织，必须壁垒坚固，才能应付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变故。“上海区”之不断调整人事组织，也正是为此。而我们的处境，则迨在三面受敌、风雨满楼中：租界警探，敌友参半；日本宪兵，更是对头冤家；“七十六号”之臭名远播，已为人所共知。

壁垒坚强迎接多面挑战 91

“日本宪兵队”惨无人道 97

罪恶昭彰的“七十六号” 105

以雷霆万钧之势打击魔鬼 111

## CONTENTS 第五章 “军统局”全面工作检讨

抗战初期，由戴雨农领导的“军统局”，曾做过一次系统性的全面工作检讨，戴先生本人，也做了自我检讨。据笔者所知，这是他平生的第一次，也是仅有的一次。他自认：“个性强、主观重，上下意见不能完全沟通，策划督导未能尽善。”以事实为证，他说的都是真话。

八年抗战初期“军统局”工作检讨 119

未经许可接受了一批赠与的武器 128

有政治背景无反间作用的奇人奇事 134

## CONTENTS 第六章 无名英雄之死，重于泰山

八年抗日之战，固然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史实流传于今，唯有我“军统局”方面，格于本身工作特性，一直恪守事事保密、只做不说的传统，乃至在全部抗战历程中，究竟有多少同志牺牲？都是怎样牺牲的？是哪些人？根本无从确定。未及登录而无案可稽者，不在少数。

没有名籍、生死不明的先烈们 ■145

萧氏一家满门忠贞 ■152

我们的同志做了敌伪的“活人祭” ■159

## CONTENTS 第七章 雷霆万钧，格杀日本武装官兵

二十九年（1940）初，“上海区”拟具“歼敌计划”，建议上级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、有限度的情况下，可权宜处置——格杀日军武装官兵，而无须事先申报。本案自二十九年（1940）开始执行至三十年（1941）为止，根据敌方公开发表的统计资料，前后击毙、击伤日军官佐共60余名。实际人数，则远远超过此数。

授权便宜行事的“歼敌专案” 171

日本宪兵留下来的一段记录 181

“抗日杀奸团”为抗战奉献牺牲 187



## CONTENTS 第八章 扑朔迷离的张啸林被刺案

“大亨”是有财有势的特殊人物，只产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租界。张啸林者就是“租界大亨”，在他得势之际，虽说不上呼风唤雨，却也为所欲为，的确风光过好长一阵子。抗战后，因为他通敌有据，而又不听政府劝导离开上海，乃下令予以制裁。

这件案子不一定是我们干的 197

事实该怎么样便怎么样 205

一篇游戏文章写得满纸荒唐 210

林怀部仍在人间 215